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1.016

1937—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阐释

——基于党报纪念文本的分析

李军全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事件,任何政治力量都以继承这笔革命遗产为政治目标。1937—1949年,基于政治生存环境和自身实力,中国共产党将辛亥革命纳入到自身革命历史逻辑中,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史事、败因和继承者等问题,强调自身与辛亥革命的关联,论证其继承辛亥革命事业的合法性,从而获取辛亥革命话语权。这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性向执政型政党转变提供了法理基础,也是其高超政治智慧的一个侧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辛亥革命;话语;纪念文本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5)01-0106-06

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或政党极为重视建构属于自身的政治文化体系,重大历史事件因其特殊的价值备受重视。纵观20世纪的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更是将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双十节”)。对于各种政治力量而言,辛亥革命的最大价值在于其革命正统性和政权合法性。因此,一旦掌握了阐释辛亥革命的话语权,便意味占据了这一正统性和合法性。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先天性地丧失了掌控话语权的有利时机,中国国民党则长期以正统自居,独自享用辛亥革命事业的政治遗产。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辛亥革命这一政治资源为自己的政治任务服务?依托政治生存环境重新深度阐释辛亥革命,从而将自身革命目标与辛亥革命事业联接是其中关键所在。为此,本文拟以1937—1949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刊发的有关

辛亥革命的纪念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挖掘纪念文本背后的主观意图,探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自身与辛亥革命事业联接在一起,且取得辛亥革命阐释话语权的,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管窥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的政治意蕴,揭示政治力量操控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

一、辛亥革命史事的阐释

抗日战争爆发后,暂时弱化了政治分歧的国共两党携手对外,按照政治协商框架,双方统一于中华民国统治体系之中。此种政治情势下,象征中华民国的“双十节”被纳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节庆序列中,受到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每逢节日,中国共产党都会组织庆祝活动,通过党报刊登关于辛亥革命的社论、宣传大纲、领袖讲话等不同文体的纪念文本。然而,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是要再现革命往事的情景,而这种出于崇敬的再现意味着回忆原先的情景,而不是仅仅为了纪念。”^[1]因此,基于中国

收稿日期:2014-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DJ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M55012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重点项目(SK2014A372)

作者简介:李军全(1980-),男,河南浚县人,淮北师范大学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革命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共产党政治文化体系的纪念文本不仅要通过回忆和讲述再现辛亥革命的历史情景,还要从中寻求自身政权与辛亥革命的关联,最终达到感化社会群体的历史认知、获取政治认同的政治功能。

1938年“双十节”是国共政治关系理顺后的第一个国庆日,重现辛亥革命的历史场景成为中国共产党各种纪念文本的开场语。一份纪念宣传大纲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辛亥革命的史事:“从前的满清政府,是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工具,是最腐化的一种官僚机关;在它的黑暗野蛮的专制统治下,出卖了不少的民族利益,榨取了大量的民众血汗,使得国势日危,民不聊生。因此,于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领导下,新军的一部分首先起义于武昌,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不及一月,革命军已占有十余省,满清政权即随之瓦解,后即于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即由此出现于世界。”^[2]上述描述基本上界定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过程,集中表现出两层意涵:一是强调辛亥革命发生的民族因素,将民族危机视为革命发生的原因所在,视辛亥革命为挽救民族、推翻外来侵略的革命,将满清政府斥为“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工具”和出卖民族利益的“最腐化的官僚机关”;二是强调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不仅将其视为革命力量的“领导者”,还突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领袖地位”。这样的史事阐释有意识地突出辛亥革命中的“民族矛盾”,弱化其他矛盾,显然与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紧密相关,实质是借助“民族矛盾”将辛亥革命事业与抗战事业联结起来,暗含从事抗战就是延续辛亥事业。同时,对孙中山领袖形象的阐释表露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是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合法政党,但认同的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在这种阐释体系下,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上发表的各种纪念文本对辛亥革命史事的描述基本延续了此种精神,只是文字表述详略有所差别,比如对辛亥革命发动者的表述,不是沿用“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这一说法,而是或使用“孙中山先生等先烈”,^[3]或使用“孙中山先生”。^[4]

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①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纪念文本对辛亥革命史事的阐述有了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革命策动者的描述上,暂时弱化了“孙中

山”等英烈,突出强调“革命党人”的作用。比如,1945年“双十节”,《抗战日报》刊登了一篇纪念文章,文中指出:“武昌起义是由革命党人策动下的新军的一部分——工程营首先发动的。^[5]那么,为何要强调“革命党人”呢?文中表述到:“革命党人”不仅包括“资产阶级、华侨资本家、商人以及一部分同情革命的新官僚”,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广大的下层群众、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贫民”,正是这些群体组成了“参加革命的三合会、哥老会和新军”,这就是说,“下层群体”也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主力军。^[6]此种阐释最大的不同是引入了符合中国共产党政治属性的阶级话语,更加注重辛亥革命的发动者,突出革命中的阶级因素,将辛亥革命发动者进行阶级分层,不再只限于资产阶级,还有下层劳动阶级,而下层劳动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相吻合。通过“革命策动者”将自身革命事业与辛亥革命联结起来,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的历史渊源。

二、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阐释

节日纪念过程中,阐述纪念对象的目的在于突出其意义,而这种意义总是服务于纪念活动组织者的政治需要。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阐释辛亥革命史事是从历史渊源上将自身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阐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则是进一步的逻辑推演。

关于辛亥革命的结果,各种纪念文本阐述一致,均是成败参半。对于成功和失败的认识,文本的描述也较为一致:成功之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失败之处是“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民国有名无实”。然而,纪念文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阐述前后变化明显。

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边区政府均会隆重地纪念“双十节”,其中,总结辛亥失败原因、吸取教训是纪念活动应有之义。此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维护统一战线、开展政治动员工作,辛亥革命败因的阐述也围绕这一任务展开。1938年10月5日,《新中华报》刊载了《“双十节”国庆纪念宣传大纲》,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统一战线的破裂”;一是“没有认真地去组织与领导广大民众到革命运动中来”。^[7]1939年“双十节”,在日军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投降份子日渐增多,国共统一战线也由于两党摩擦出现裂痕,纪念文本对辛亥革命败因的

阐释又集中到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份子上来。《新华日报》的一篇纪念社论直言辛亥革命败因在于“革命阵营中某些分子与反革命势力妥协”,^[9]同样,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双十节”的大会上,领导人朱德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此种认识,认为失败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力量之强大和一部分革命势力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软化”。^[10]《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对辛亥革命败因的阐释有了新的认识,1940年“双十节”,许多纪念文本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当时还未形成独立的力量”,^[11]“更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12]只是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此后纪念文本普遍使用的阐释模式,待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存环境好转时,才逐渐成为较为固定的言说模式。

囿于抗战大局和政治局势,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败因的解读,有意识地突出统一战线和时政大局。但是,1941年“双十节”后,国共关系日益紧张,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阐释辛亥革命败因时将焦点逐渐指向统治集团——中国国民党。曾是国民党核心政治领袖而后公开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是最先被挞伐的对象。在关于纪念1941年“双十节”的决定中,中共中央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当时革命阵营中包藏着投降袁世凯的妥协份子,例如汪精卫之流。”^[13]汪精卫毕竟背有投敌罪名,且又被国民党除名,所以各种纪念文本在讨伐汪精卫时虽涉及到国民党,但并不直接。

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政治生存环境的变化,国共双方之间的政治裂隙愈来愈大,纪念文本中开始出现将辛亥革命失败归于国民党的言论。1944年“双十节”,边区政府在延安筹备纪念会上指出:“是那时的豪绅买办出身的国民党人中途与袁世凯辈妥协,致使革命失败”。^[14]一位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在国庆座谈会上发表演讲时,甚至指出辛亥革命失败就在于“国民党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断和北洋军阀等封建余孽妥协。”^[15]辛亥革命是中国国民党取得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象征,纪念文本将辛亥革命败因归于国民党无疑会削弱这种政治合法性,无形中是对中国国民党独霸辛亥革命政治遗产资格的审判,尤其是当此种认识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后。当然,此种阐释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图,这在1945年“双十节”的一篇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知识材料中有所表

露。“当时人民的不觉悟,还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它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结果除了推翻帝制外,并没有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这两个反革命势力。”^[16]由此看来,经历过“反革命势力”、“妥协投降份子”和“国民党”等文本阐释后,中国共产党将辛亥革命败因最终归结到革命领导权上,认为正是由于缺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先进阶级政党,辛亥革命才会失败。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能够避免革命失败的执行者,才是真正能完成辛亥革命任务的领导者。在此种解释体系下,中国共产党自身与辛亥革命的关联显而易见,而中国国民党不仅被排除在辛亥革命领导者行列外,其继承辛亥革命事业的合法性也受到挑战。

三、辛亥事业继承者的阐释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华民国宝贵的革命遗产,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珍贵的历史资源,任何政治力量都以继承这笔革命遗产为政治目标。如果说纪念文本阐释史事、败因是突出中国共产党自身与辛亥革命关联的话,对辛亥革命事业继承者的阐释则是逻辑推演的最终归宿。

抗战初期,各种纪念文本对辛亥革命事业继承者的阐释都肯定了中国国民党的合法地位。1938年“双十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的讲话,认为“历史的任务要求国民党恢复辛亥及北伐的精神,来完成辛亥革命以来未竟的事业!”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愿追随国民党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国民党,一致地为战胜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17]在肯定中国国民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强调自身的合法性,正如有的纪念文本公开呼吁的:“在我们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队,却是高度地发挥了辛亥革命殉国诸烈士的奋勇精神”。^[18]此外,在阐述中国国民党政治主张的时候,各种纪念文本总是将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一同阐述,彰显国共两党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比如,一篇纪念社论如此描述:“今年‘九一八’蒋委员长昭告国人:‘誓死恢复我们东北失地’;中国共产党历次号召:坚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蒋委员长‘九一八’‘自立抗战’和‘自力更生’的昭示,是克服困难,坚持持久战争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中央‘七七’宣言,关于坚持团结与实现民主政

治的号召,更是渡过难关,积极准备反攻的不二法门。”^[14]由此可见,此时期的纪念文本对中国国民党继承辛亥革命事业表现出了政治认同,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作用,将辛亥革命视为国共两党共同拥有的政治资源。

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继承者的阐释,注重突出自身继承的合法性,弱化中国国民党的继承地位。在各种纪念文本的思想逻辑框架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抗战事业与辛亥革命事业的一致性。如《抗战日报》的一篇纪念社论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今日的抗战与辛亥革命是一脉相承,不能分开的。”^[15]同时强调,抗战开始后,只有抗日根据地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事业,认为“壤地虽小,却因为发动了民众,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却表现了极大的抗日力量。”^[16]在中国革命历史逻辑的推演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辛亥革命纳入属于自身革命历程的言说模式中,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历程为逻辑点推演中国革命进程。1941年“双十节”,中共中央指出:中国革命进入反帝反封建的新阶段后,才有了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然后就有了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北伐革命战争和红军的英勇奋斗,才有了现今国共两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的最忠实的继承者,对于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誓与全国一切真诚革命志士一道继续奋斗”。^[17]1942年“双十节”,《解放日报》刊发纪念社论,吸收和运用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辛亥革命的理论分析,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才是辛亥革命遗产唯一的继承者,又指出辛亥时期的志士如朱德、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李六如等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先驱者,而且有不少在今天还是我党的干部和领导者。^[17]在论证自身继承合法性的同时,各种纪念文本开始质疑中国国民党的继承者身份。1944年“双十节”,《解放日报》的纪念社论将国民党当局与满清政权相提并论,认为“今天的国民党当局和辛亥(革命)时的满清政府,在其压迫人民、危害国家和顽固不化的程度上,既不说是超过,至少也是‘何其神似’。”^[18]辛亥元老续范亭发文明言:“今天中国这一副危急存亡的重担子,国民党实在早已担不动了”,

奉劝国民党“要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决心”。^[19]

解放战争时期,各种纪念文本不仅继续强化中国共产党继承辛亥事业的合法性,还强调唯一性,公开批判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继承的合法性。1947年“双十节”,《新华日报》的一篇纪念文章公开呼吁:卖国贼蒋介石所作所为,完全背叛了总理,侮辱了三民主义,玷污了革命。^[20]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纪念宣言中也明确指出:早在1927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21]类似的纪念言论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上较为常见。与此不同的是,纪念文本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继承辛亥事业合法性的言论增多。曾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的范龙章指出:“辛亥之役,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推翻满清,现在我们要反对法西斯独裁,赶走美帝国主义军队,这个希望就寄托在人民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司令的领导上。”^[22]诸如徐特立等同盟会元老也纷纷表示:“只有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才有正确的领导,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得到彻底的实现”,^[23]“真正继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只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其它,同志们,中国的解放历史任务,过去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是落在我们的肩上了!”^[24]甚至莫斯科广播电台评论员马西努也表示:“中共实现了孙中山对他们的希望,当他逝世后,国民党领导机关被反动份子夺取,和他的学说被放弃时,中国共产党把执行三民主义的事业,拿到了自己的手中。”^[25]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纪念言论对辛亥事业继承者的阐释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国民党独自继承,到国共两党共同继承,再到中国共产党独自继承的话语转变。这种阐释体系的变化,固然与中国共产党渐趋成熟的话语操控能力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壮大密不可分。

四、结语

话语是政治权力进入社会层面的重要载体,权力只有进入特定的话语系统后才能发挥出政治效力。因此,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谁掌控话语权,就意味着拥有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至于辛亥革命的话语权,中国国民党长期以辛亥革命事业继承者自居,无论是在政治威望上,还是在社会舆论中,都

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而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要想得到广泛的政治认同,击败远远强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获取辛亥革命话语权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强化自身与辛亥革命的逻辑关联,还需要削弱国民党与辛亥革命的法理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构建一套符合自身政治文化思维的辛亥革命阐释体系。具体来说,主要是通过对辛亥革命史事、败因和继承者等问题的阐述,强调中国共产党自身与辛亥革命的关联,推演中国共产党继承辛亥事业的合法性。当然,该体系也是与中国共产党所处政治环境和政治力量密切相连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阐释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中,表现出抗战初期强调民族革命、突出统一战线,中期注重将辛亥革命纳入到自身意识形态模式中进行解释,后期强调政治革命、论证继承辛亥事业的唯一性等特征。

应该指出,“从纪念文本话语中再现历史的记忆,并不是简单的材料组合和粘贴”,^[26]因为纪念文本不仅是一定政治语境下的具体产物,还是文本作者思想意图的集中表达。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为满足中国共产党现实政治需要,各种纪念文本在阐释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总会表现出一种对史事有所选择、提炼和裁剪的阐释方式,这种话语权的阐释看似没有战场胜利来得畅快,却在无形中塑造出一种符合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的舆论氛围,当所处生存环境逐渐好转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然获得了掌控辛亥革命的话语权,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性向执政型政党转变提供了法理基础,也是其高超政治智慧的一个侧证。

注释:

- ①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辛亥革命性质有了新的解释,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指出辛亥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参考文献:

[1] [法]莫娜·奥苏夫.法国大革命中的节日[A].[法]勒戈夫,诺

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C].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301.

- [2] “双十节”国庆纪念宣传大纲[N].新中华报,1938-10-05(2).
 [3] 纪念“双十节”[N].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10-09(1).
 [4] 国庆纪念[N].解放日报,1941-10-10(1).
 [5] 史正.辛亥革命[N].抗战日报,1945-10-10(4).
 [6] 第二战区朱副司令长官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演辞[N].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10-21(4).
 [7] 纪念“双十节”[N].新中华报,1940-10-10(1).
 [8] 纪念“双十节”坚持团结抗战[N].抗敌报,1940-10-10(1).
 [9] 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N].解放日报,1941-10-07(1).
 [10] 边区政府筹备热烈庆祝国庆节[N].解放日报,1944-10-04(1).
 [11] 边府国庆座谈会上热烈赞同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N].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10-13(1).
 [12] 周恩来.辛亥、北伐与抗战[A].崔奇.周恩来政论选(上)[C].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225-226.
 [13] 纪念“双十节”慰劳前线将士[N].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10-09(1).
 [14] 以新的胜利来纪念“双十节”[N].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10-09(1).
 [15] 辛亥革命三十周年[N].抗战日报,1941-10-09(1).
 [16] 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N].解放日报,1943-10-10(1).
 [17] 纪念辛亥革命[N].解放日报,1942-10-10(1).
 [18] 今天和辛亥[N].解放日报,1944-10-10(1).
 [19] 续范亭.国难严重中纪念国庆[N].解放日报,1944-10-10(4).
 [20] 吴玉章.纪念辛亥革命要打倒中山先生的叛徒蒋介石[N].新华日报(太岳版),1947-10-12(2).
 [21] 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纪念[N].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10-11(1).
 [22] 延安“双十节”万人集会[N].新华日报(太岳版),1946-10-15(1).
 [23] 林伯渠.发扬辛亥革命精神打倒卖国贼蒋介石[N].人民日报,1947-10-12(1).
 [24] 徐特立.从今日回忆辛亥革命[N].人民日报,1947-10-15(1).
 [25] 马西努.评“双十节”[N].人民日报,1947-10-19(1).
 [26] 魏建克.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责任编辑:卢圣泉)

Interpreta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f CPC (1937—1949)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Party Newspaper Memorial

LI Jun-qu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y political will to inherit the revolutionary heritage for political objectives. Form 1937 to 1949, based on the political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own strength, the CPC interpre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myself revolutionary logic, through historical events, The causes of the failure and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emphasize on association with revolution, legitimate argument inheritance, in order to obtain discourse right of 1911 revolution. This is not only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PC from revolutionary rule to political party, but also one side of the card on superb political wisdom.

Key words: revolution led by the CPC; the revolution of 1911; discourse; memorial text